

第4卷第1期, 2011年2月

(本期译自 Number 62, Winter 2011,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Vol. 4, No.1, February, 2011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国际问题

排名之季来临.....	1
建立新的世界一流大学中的九类常见错误.....	6
高等教育道德的腐败.....	9
通识教育的全球视点.....	12
国际高等教育中的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	15

高等教育国际化

五个关于国际化的谬传.....	18
国际化的终结.....	20

非洲的高等教育

非洲高等教育: 二十世纪的起伏.....	22
埃塞俄比亚: 私立高等教育和地区间不平等.....	24

澳大利亚国际高等教育问题

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 一路下滑.....	26
澳大利亚: 商业化的危险.....	28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

风雨飘摇的加州: 奥巴马的强心剂能持续多久?	30
委内瑞拉高等教育: 查韦斯革命.....	33
中国学生和印度学生流动性背后的驱动力.....	35

新书简介.....	37
-----------	----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主办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副主编：王 琪
编辑：吴 燕

刊号：沪（K）第 0621 号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7986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jihe/index.htm>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ociate Editor: Qi Wang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Addres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7986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jihe/index.htm>

《国际高等教育》简介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际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并将努力发挥中外高等教育交流的桥梁作用。

本刊由两部分组成：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编辑出版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中文版，每年 4 期；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围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编辑出版的专辑，每期一个主题，每年最多出 6 期。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每期包含十余篇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文章以及新书简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编辑的专辑则包含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评价与排名、研究生教育、科学英才迁移等热点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综述文章、书评以及有关的会议和活动信息。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uoji Gaodeng Jiaoyu) is an online journal with an aim of playing the role of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ies. It consists of 4 issues each year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 in USA and up to 6 issues each year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ranking, graduate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of academic talents.

Each issue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y Boston College contains more than a dozen of short articles covering major aspect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new publications. Each issue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ains original studies, preliminary reports, review pap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book reviews, and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and opportunities on the selected topic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issues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online at <http://gse.sjtu.edu.cn/en/>.

排名之季来临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即将迎来新的学年，而当下正是排名之季。主要的国际排名已在近月公布，其中有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简称 ARWU)，“QS 世界大学排名”(the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学排名”(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两项重要的美国大学排名也于近期公布，分别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美国大学排名”(The US News & World Report America's Best College Rankings)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博士研究生项目评估”(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ssessment of Research Doctorate Programs)。除了这里所列的国家或区域高等教育机构的排名，还有许多其他的排名。例如，欧盟正在支持一项重要的排名项目。德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心(The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已经做出一份创新计划，旨在对德国各大高校进行排名。此外，还可以列出许多其他的排名。本文将对主要的大学排名和与排名相关的讨论进行总体评述。

排名的必然性

即便现在排名不存在，将来也一定会有人创造出排名。排名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全球高等教育竞争和商业化的必然产物。高等

教育的潜在客户(即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希望了解众多高校以寻求最合适的选择，即最相关和最有优势的学校。各类排名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些问题。大众化高等教育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术机构，营造了更多元和复杂的学术环境。排名首先在美国流行起来，这并不出乎意料。因为美国最先经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当大学的数量日益增加，排名自然就成为了人们选择大学的方法和信息之一。各学院和大学也希望有一个标准能使之与同类机构进行比较。尽管有不小的缺陷，排名亦不失为实现这些目的的便捷途径之一。最有影响力同时也广受批评的综合排名到如今已有17年的历史，这便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美国大学排名”。还有许多其他排名聚焦于一系列不同的因素，从“最物超所值”的大学到最“派对、逍遥”的大学，还有最“高科技”的大学，关注的方面可谓各式各样。虽然很多排名可信度不高，但是公众仍然很认真地考虑这些排名所提供的参考信息。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排名自然也趋于国际化。已有大约300万的学生出国留学，其中许多选择就读于那些最优秀的大学，并认为排名提供的信息非常有用。学术界已经全球化，各大学术机构也设法与世界上的同水平机构比肩，力求竞争到更好的学生与师资。学术界的决策者们以及政府官员

有时将全球排名作为资源选择和制定其它决策的依据。

鉴于以上种种问题，排名对世界学术界而言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单凭这个原因，我们对排名应严肃对待和认真理解。排名事业规模的表现之一，即为“IREG—国际学术排名与卓越协会”（The IREG Observatory on Academic Ranking and Excellence），该协会于近期在柏林召开了第五届大会，吸引了来自50个国家的160名代表。

由排名推导出的“零和游戏”并不存在

从定义上来说，前100名大学只能有100所大学。然而打个比方，新加坡国立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进步了，即使排名上升造成某些大学的排名下滑，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大学，比如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就退步了。事实上，许多世界一流大学都达到了公认的顶级学术机构的水平。的确，很多国家致力于建设并发展研究型大学，普遍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卓越的研究型大学的数量自然而然地与日俱增。在中国、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过去几十年里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已卓有成效，这些国家的顶尖大学的办学质量大幅提升。早在十年乃至二十年前，日本的大学就有了很大的进步。亚洲大学的崛起在大学排行榜中表现得并不是很明显，这是因为想要将老牌的领军大学挤下宝座确实不易。因而，大学排名低估了亚洲大学和其它一些地区的大学的进步。在未来不可避免的是越来越少的英美大学将出现在世界前100名大学的榜单上，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就倒退了，而是意味着其它地区大学的办学质量有所提升。这并不让人失落，反倒是件值得庆贺的事。

或许比排名更好的方法是类似卡内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分类的国际分类体系。在1970~2005年间，卡内基基金会制定出一系列明确的针对学院和大学的分类标准，并根据标准对在规定类别范围内的机构进行分级。不是按排名划分这些学校而是根据各自学校的发展愿景对其进行描述。这就避免了“零和问题（zero-sum）”的出现。许多人认为分类里大学前的特定编号与排名中的排序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不过分类里，大学所属的排名范围还是较为可信的。此外，相比位列第17名或第154名，一所机构究竟是位于15~25名的范围还是150~170名的范围里可能才是真正有用的信息。根据分类描述更能真实地反映现状。

国际排名里，教学的身影何在？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一个词，无处可寻。教学是一所大学最主要的职能之一，但常常被排名所忽视了。这是为什么？主要因为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很难量化和衡量。而跨越不同国家和学术体系去衡量教学质量和效果更是难上加难。因而，许多排名没有将教学考虑在内。新一期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学排名”意识到了教学的重要性并设计了几种评价体系设法衡量教学。被衡量的指标有教学声誉、教师学生数量比、教师人均博士学位数量等。问题在于事实上很难用这些指标去衡量教学，更不要说深入评估教学效果了。再者，向学术负责人和行政人员询问教学质量也不能得到多少有用的信息。不过《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排名至少意识到了教学的重要性。

那么，排名衡量的到底是什么？

简单说来，排名主要是用各种方法衡量

科研产出。的确，科研产出是最容易衡量，也是唯一能准确衡量的评价标准。不同排名所采用的评价方法不尽相同。有些排名，尤其是QS排名，着重采用声誉调查，即世界各地学术界对某一大学的评价。QS排名自行选取一些学术群体，根据他们对各所大学的声誉评价并结合其它一些非声誉因素做出评估。《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排名则主要关注一系列评价标准，包括学术界评价，以及通过与数据提供方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合作从而选取的其它指标，例如通过引用分析体现的发表论文的影响力、科研经费、科研创收等。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只衡量科研表现，评估一系列相关的科研指标，对大学科研的评估结果可能是最为准确的。

科研成果相对来说更容易衡量，科研声誉的影响力也最大，因而排名的焦点大多放在对科研的评估上。再者，世界上的所有大学都想要成为研究型大学，最具声望和世界顶尖的大学也都是研究型的。这两个因素就像一股强劲的推动力，加强了科研表现作为一个重要评价标准在各大学排名和全球分类中的至上性。

学术中心和学术外围

位于世界知识中心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及这些机构里的学者和科学家自然在排名上占有优势。像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英语国家的学术机构在这方面遥遥领先。历史传承、语言、资金、对全世界顶尖师资和学生的吸引力、学术自由的传统、基于竞争和精英体制的学术文化及其它一些因素造就了这些大学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

所有排名都青睐某些特定类型的科研，因而在大学排名上的表现亦有所倾斜。特别

是对硬科学偏爱有加，即自然科学、技术、工程、材料四个领域(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简称STEM)。这是因为这些学科最容易发表论文，论文被引用得最多，科研经费也最多。排名青睐使用英语的大学和教员学者。被相关数据库收录的英语学术期刊为数最多，英语国家本土大学的教授也最容易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和接触到权威的出版商，并加入一些在科学领域领先的学术圈。

西欧和日本的大学进入核心知识界相对容易，并能获得足够的支持。香港和新加坡的学术机构在财政资源上有所优势，并且它们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并倡导聘请在国际研究领域活跃中的师资。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香港和新加坡的大学在排名上的成绩也可圈可点。一些新兴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表现也愈加不凡。它们渐渐地从外围领域移至中心地带。然而，外围领域里一些获得有力支持的大学，例如中东地区的大学，在成为学术中心的道路上却有许多的劣势。因为，一个国家的学术文化是处于中心还是外围和这个国家的大学排名高低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全球化时代，处于学术外围的学术机构更易通过精心策划和足够的资源支持克服边缘性这个弱势。相比从前，和机构系所等组织一样，个体的学者也更容易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做出成绩。虽然学术中心和学术外围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可渗透，但依旧难以克服。

改变球门

许多排名因频繁更改评价标准或方法而被诟病，因而难以进行历时性的衡量和有效的机构间比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就特别喜欢出人意料地改变评估价标准，这使得

各大学和学院无法根据往年情况始终如一地提供同类型的数据。《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排名改善了评价方法，可能会有些变化。ARWU排名的标准和方法变化最少，这无疑促进了学术机构和国家在数据提供上的连贯性。

对2010年各大排名的评论

简要分析主要的排名确有裨益，这样可以了解各大排名的优势所在，更重要的是了解其弱点。尽管以下讨论并不完善也非基于对排名的详尽分析，但为批判性地看待排名提供了一些依据。

“QS世界大学排名”的问题最多。在2004年至2009年间，QS与《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一起公布排名。自此以后，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发布自己的排名。从一开始，“QS世界大学排名”主要依靠声誉指标，通过随机选取一群教育家和学术界人士并询问其意见来分析大学声誉，这种方法的可信度被许多专家所质疑。另外，QS还调查毕业生雇主的评价，这混入了更多易变和不可靠的因素。有些人建议声誉在排名中的角色应该去除掉，而其他人士则认为还是应将声誉因素考虑在内，但赋予的角色不应太重要。40%的QS排名基于声誉调查，这或许是QS排名结果随时间易发生显著变化的原因。高等教育界如何对待QS排名，这依旧是个问题。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简称ARWU)通常被称为“上海交通大学排名”、“上海排名”，或者ARWU排名。始于2003年，作为最早出现的世界排名之一，ARWU排名不仅稳定而且透明。该排名只衡量科研产出，采用的评估方法也清晰明了，始终如一。它选取六项衡量标准，包括发表在《科学》

(*Science*)与《自然》(*Nature*)上的论文数、各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量、获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校友的折合数、科学引文索引(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引用次数等。ARWU排名对世界上1000所大学进行分析。该排名不依靠学术机构自己提供的信息。ARWU排名的有些衡量标准更照顾老牌的西方名校，尤其是那些诞生或能吸引诺贝尔获奖者的大学。这些大学能支付更高的薪水，并配有先进的实验室和图书馆。引文索引通常收录语言为英语、被顶级评论员评论过的期刊论文，这更是让那些拥有编辑部和关键评论员的大学优势大增。尽管如此，ARWU排名的连贯稳定、目标清晰、透明度高是其卓越的优点。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学排名”，首次出现在去年9月，是迄今最新也最具开拓力的排名。它试图吸收早先各类排名的优点，提供一个更为广阔和多样化的视野。《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排名的评价标准将大学的几项主要职能囊括在内，即科研、教学、社会服务以及国际化——由于此举，该排名应当评为最佳排名之一。该排名将声誉指标纳入科研评价标准中衡量，并结合分析论文引用次数、论文发表篇数、学位授予数目和其他指标。虽然该排名尽可能地考虑不同考量标准和指标，但在意料中的是其缺陷依然存在。有些评论家对该排名的论文发表数和引用次数的统计方法提出了质疑。其次，该排名存在许多的不一致。例如，由于行政上的某些原因，以色列的大学没有纳入排名中，美国有些大学并非只是一所独立的学校而是一个拥有多所分校的整体，如麻省州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印第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特拉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等。这个问题加剧了排名体系的不公平性。假设把加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作为整体参与排名,而不是让它的各所分校单独参与排名,那么显而易见,加州大学在全世界一定排名第一。该排名有些地方明显不够准确。土耳其比尔肯特大学(Bilkent University)和香港浸会大学(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怎么会排在密西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斯德哥尔摩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tockholm)和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前面呢?亚历山大大学(Alexandria University)又怎么会被排进前200名大学中呢?这些异常之处完全不能通过事实的检验。希望此类问题终能被解决。

现在是时候对期待已久的国家研究委员会“博士研究生项目评估”说上几句话了。晚几年出现的这项研究因为评估方法上的缺陷广受批评。事实上,与其说它是一份有价值的对当前现状的分析,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国家研究委员会“博士研究生项目评估”试图采用更精细的评估方法,比如考虑多达20个与博士生项目相关的变量。其他一些排名更多地采用专断的衡量和比较方法。尽管全面成功没能实现,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该排名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年度排名的影响力持续依旧。因其评估方法改变过于频繁,对声誉因素评价过于依赖,将复杂的现实状况过度简化,该排名在美国被抨击得很厉害。然而,它仍旧被广泛使用,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测评分高的大学和院校尽管也抱

怨该排名方法上的欠缺,但还是会发布这项排名。至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将不同高等学校分类为公立大学、文理学院、地区大学等,意识到了不同机构在使命和目标上的区别,明白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与哈佛和伯克利大学竞争。

我们在哪里?

毫无疑问,大学校长、政府官员,以及来自北京、波士顿等世界各地的学生及家长都会分析一个或多个在本文中提到的排名,甚至许多本文并未提到的排名。各种决策大部分都依据这些排名而定:政府部门决定财政拨款的动向,院系决定教育项目的建立发展甚至是取消,学生家长决定该上哪所大学或学院,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现今,排名比比皆是,这就好比是“购者自慎”:使用者要充分了解排名的用途和问题。事实却常常不是这样。某一特定的大学排名对许多使用者很有说服力,这显然是个错误。排名自身带有局限性,而且只衡量高等教育的一小部分。政府应当像关注一所大学的科研实力那样去关注一所大学如何融入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而学生则应当关注他们自身的兴趣和能力而不仅仅是一所机构的名声。然而很少人注意到排名自身的缺陷。

对排名的批评不会让排名消失。竞争、相互比较的需要、不可避免的全球化使得排名成为21世纪教育全景上一道持久亮丽的风景线。真正的挑战在于深入了解排名间的细微差别以及排名的使用与误用。

建立新的世界一流大学中的九类常见错误

Jamil Salmi

世界银行 (the World Bank) 高等教育主管、教育经济学家

电子邮箱: jsalmi@worldbank.org

过去十年里,“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一个热门词汇,用于描述那些在各种国际排名里位居高等教育系统顶端的研究型大学。全世界各国政府无不响应这场全球声誉竞赛,加大拨款力度,积极促进各国精英大学的发展。例如,许多国家地区发起各种“精英计划”,其中包括中国、丹麦、德国、尼日利亚、俄罗斯、韩国、西班牙和台湾。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还鼓励该国几所顶尖大学合并以便实现规模经济和在全球竞争里取得优势。有些国家甚至决定直接从起跑线出发,带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明确目标,建立全新的大学。

要实现创建高质量的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说起来要比做起来容易得多。要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学术机构,仅凭对各大排名缺乏思考的关注和政府提供的大批经费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近年才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本文简要阐述当下建立新的世界一流学术机构中易犯的几大常见错误。

宏伟校园,却是金玉其外

基础设施显然是一所新大学看得见的有形部分。把许多心思和精力花在设计 and 建造气派的校园里再平常不过,也是无可厚非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在学生良好的教育经历中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人员也需要足够的实验室来进行前沿的科学探索。然

而,没有一个合适的管理体系,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团队,没有精心设计的课程计划,没有资质合格的教员,再美丽的校园也只不过是徒有其表。

先建设基础设施,后设计课程

人们通常觉得根据学校已有的物理环境安排调节教学和学习活动是件很容易的事。传统的讲座式教学的确如此,但创新型的教学实践需要配备相应的设施。比如,互动式课堂、探索型学习以及基于团队合作和互相学习的教学活动如果在传统的讲堂乃至教室里进行,将会受到物理条件上的限制。关于新大学的创始,人们应当先对这所大学的使命和前景有清晰的概念和理解,然后再设计与建设校园。在建设物理设施之前,首先需要准备好一所新大学的学术计划,这是相当关键的,应当根据教学科研的需要配备相应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反过来让前者去适应后者。

一味的进口主义

为什么要走别人的老路呢?负责建立新大学的团队常常向工业国家的顶级大学看齐,直接把这些大学课程设计的某些要素“买过来”,而不愿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去设计自己的项目。虽然这一番“拿来”看似便捷实用,但对于一所致力于成为高水平大学的机构而言,这并不是建设新大学学术文化最为有效的途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和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相信复制它们的组织结构和学术模式可能成功的话, 那就是异想天开了。再者, 四处参考借鉴, 然后把各所一流大学课程设计的元素像拼碎片般拼凑起来, 这种想法实在是不切实际。不同大学建立在不同的国家中, 拥有不同的文化。要想把每个元素轻易地拼接起来然后形成新大学的学习和科研文化, 这同样是脱离实际的想法。

应带着建立生态系统的想法去计划

北美和欧洲一流大学成功的原因有人才集中、资源丰富和组织良好。复制这些因素确有必要, 但仅凭这些要素还不够全面, 不足以支撑起一所成功的一流大学。如果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未能足够支持大学的运营, 要想创建一所充满生机的大学并始终保持它的欣欣向荣虽说并非不可能, 但也着实是项艰巨的工程。这里所指的“生态系统”的要素主要包括国家级的领导力 (对高等教育未来的瞭望预测和实施改革的能力)、组织框架 (组织结构和在国家层面及学校层面的管理流程)、质量保证体系、整合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沟通机制、财政资源和激励以及数字通信基础设施。一旦缺失某个元素或缺乏要素之间的协调统一, 那么新大学的实力很可能受损, 大学不得不向缓慢的发展妥协。

推迟设立董事会和领导团队

建立一所新大学的决议通常是政治决定, 由一个政府部门或技术项目团队负责将决议付诸实施, 这常常会导致计划和实施的中央集权化。然而, 一所新大学的建立不能交给对这件事漠不关心的委员会的手上。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应交由充满活力的领导团队

负责和实施, 并在能提供指导、下放权力、独立自主的董事会的监管下进行。在一开始就建立合适的管理组织框架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只考虑当前资本成本, 忽略长期融资

一所新大学的发起人常常充满激情地宣称一大笔巨额资金投入了新大学的建立。然而初始资本投入仅仅是总工程所需投入的一小部分。在新大学最初几年的运营里提供充足的支持非常重要, 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商业模式, 使新大学经济上可持续, 并不断成长。

在实现量化目标上过于激进

新大学的领导者们有时会认为他们能够招收大量学生, 其人数能达到几万人。要想实现如此大的招生规模, 其教学质量很少有不受影响的。在 70 年代, 舒马赫 (E. F. Schumacher) 在他的著作《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提出成功的发展项目都拥有完美小巧的规模。小在今天仍旧是美好的, 尤其当“小”的概念应用在建立新大学上。当质量优先时, 从小数量的项目和学生规模起步总是个好办法。一旦形成了稳固的学术文化, 扩大规模就容易得多了。

期望能在 18 个月里做完所有的事

规划过于激进的另一个体现是认为一所新大学可以在数月内建成, 高质量的教学和科研可以在数年里实现。事实上, 如果计划和实施的初期完成得太过匆忙粗糙, 可能会产生有损办学质量的负效应并导致成本增加。再者, 大学建设是个长期过程, 需要稳健的领导、不断的改善和持久的耐心,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为实现前沿的科研技术应用

而发展强势传统科学上。

土实力之根本大计的辅助策略。

不提高自身实力，只依靠外国学者

聘请外国学者是加速建设新大学的常用方法。的确，通过聘用经验丰富的教师和研究人員来引进新的项目不仅合情合理，而且还是一个对提高自身实力十分有效的策略，因为外国学者的关键使命是培养年纪尚轻、缺乏经验的本国学者。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系统化的举措去吸引和留住高质量的本国学者，完全依靠外国学者可能就会造成风险，反而达不到预期目的。就像依靠外来演员和力量那样，引进外国学者只能是建设提高本

结论

创建一所致力于达到最高标准的高等教育学府是一项高尚却艰巨的事业。通向学术精英的道路充满了坎坷，然而根据前面对常见错误的讨论，有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更重要的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决定应当放在大环境中仔细考察，确保与国家总体高等教育策略的契合，确保在高等教育上避免资源分配的扭曲。只有结合细致深入、符合实际的规划，并在各个层面上发展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才是意义重大之举

高等教育道德的腐败

Stephen P. Heyneman

美国范德堡大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 国际教育政策教授

电子邮箱: s.heynean@vanderbilt.edu

“有一次系主任打电话给我，谈话有关院长女儿的考试成绩。院长当时生病住院，系主任说院长已经够遭罪了，让我不要再让他更受罪，因而我应该给院长女儿一个好成绩。”（哈萨克斯坦某副教授）

“行政是个赚钱的门路。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乔治亚州某大学行政人员）

大学通常被认为是年轻人的避风港。不管政体是否稳定，经济形势是否萎靡，教育投资一直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然而，最近发现教育系统和政府其他部门乃至经济一样，也被腐化了。公平公正的价值观，本是大学体系恪守的普遍原则，如今却被特殊的人、家庭、种族和机构的利益所取代。

这种不当行为包括为攫取个人物质收入而滥用权力。高等教育是这样被腐化的：通过不法手段获取物品和服务；在大学各职能实现过程中做出欺骗行为（行政、评分、毕业、住宿、学术成果等）；教师做出不端之举（偏向某些人的家庭成员、性剥削、评分带有偏见、科研抄袭等）；在交税和使用学校资产中进行欺骗。

这个问题有多普遍？

在保加利亚、摩尔多瓦、塞尔维亚三国进行的学生调查显示，35%~45%的学生认为可以用旁门左道通过正式选拔。大约五个中有一个承认曾经贿赂过大学官员。在摩尔多

瓦，这个比例是5:2。大学里，不同学科的行贿受贿程度不尽相同。一些最受欢迎的学科如经济、金融、法律的入学竞争更激烈，学费更高，潜在收入就更多，风险也就更大。所以，这些学科更容易发生腐败问题。

教育腐败是一个普遍问题，然而不同地区的具体问题各不一样。北美地区的问题体现在学生和教员在考试中有抄袭和作弊行为。此外，制度伦理的违背体现在研究中的不端行为和围绕以下问题的伦理违反上，如募集资金、体育竞赛、入学、测验、学术管理，还有违反课堂纪律（上课迟到）、作业评分上的不公平以及在性别、国籍和意见上的偏向。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体制外的国家，教育腐败的现象更为频繁，并以多种形式呈现。在越南、柬埔寨、南亚、东欧和前苏联，主要问题在于金钱收入上的腐败——试图通过行贿来换取更好的成绩、认证以及获准参加一些选择性的学习项目。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腐败问题体现在教师经常做出不端行为和在课堂上进行性剥削。

腐败是一种文化现象吗？

有些人认为教育中的腐败和欺骗是一种文化现象，深植于一个社会群体的道德标准里。这意味着学生偏好作弊并在实施过程中

没有羞耻感。但总体上,许多学生对作弊行为表示羞愧和懊悔。在克罗地亚,89%的学生认为在考试中作弊是错误的行为,在美国这个比例大致一样,为90%。另一方面,有些报道称作过弊的美国学生认为他们的个人道德品质并无问题。这说明,在某些情况下,作弊行为是一种正常现象,可以与个人道德分开来谈。

经济和社会影响

当价格(学费、工资)被调控所扭曲时,腐败能提高效率。有些大学体系要求所有学科的教员薪资保持一致。这样一来,留住人才则需要其他不正当报酬。然而,由腐败产生的效率净收益不太可能发生在大学里,因为腐败会影响实现教育投资的其它社会目标。也因为大学旨在建立端正行为之楷模,一个大学腐败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要比海关或警察部门腐败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严重得多。既然大学的目的一是教会学生如何在未来做一个好公民,那么如果大学腐败了,又怎能期望未来的公民们洁身自好,不被腐化呢?

腐败对教学质量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如果大学官员给不够资格的学生好的成绩,那么大学就会变成一个高价格、低质量的商品。腐败不是强化内部竞争,反而是起到限制作用。诚信是建立在不违反规定、规则的基础上。一所大学如果被质疑腐败,其毕业生在劳动市场的优势就会减小。大学腐败的臭名如果传到私营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其结果要比传到当地政府和国有企业严重得多。

腐败减少了教育投资的个人回报和社会经济回报。如果学生缺乏动机去学习某些科目,却能通过对大学官员行贿,“购买”到这些科目的成绩,这样一来雇主就无法知道学

生是否具备获得学位的真实学术能力。一个大学学位的显著价值便大打折扣。雇主为降低风险,便拒绝接收那些来自被怀疑腐败的大学的毕业生,并使用测验、实习和其它过滤机制。毕业生不得不接收低得多的薪水直到他们通过在职表现证明自己的经济价值为止。技术和专业的岗位不会考虑录用那些毕业于被怀疑腐败的大学的学生。如果他们进入贿赂可能性较高的政府部门(海关、警察部门等),其腐败造成的个人收入损失将降低,然而社会成本损失依旧存在。

谁能抵制?

某些情况下,腐败已司空见惯,然而在教员群体中,腐败并未成风。教员中与腐败作战的抵制者们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也依旧洁身自好,有些是遵循道德品质原则,有些则是考虑到实际评估。不管原因是什么,他们所做的努力形成一种对教授职称通用标准的判断。这个标准包括承诺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标准要求普遍原则(对学生和教师公平公正)优先于对家庭和朋友的忠诚。就是以这样一种简单却意义非凡的方式,世界上与外界联系最少的大学里出现了一批“沉默的英雄”。这些教员为原则站了出来,没有法律和行政的支持,没有职称上的提升或经济上的奖励,他们为了公平与正义,敢于藐视位高权重的行政人员。

道德学术的元素

一所具有国际视野和远大志向的大学如何才能证明其坚持普遍原则?一所不对腐败问题公开表态的大学可能会被认为对公众如何看待大学道德漠不关心。许多机制有助于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和防止公众产生怀疑大学体系腐败的判断。这些机制包括教员、行

政人员和学生行为规范，在对外网站上发表诚信声明和每年向公众发布反映腐败事件数量及类型变化的年度报告。

可以做些什么？

许多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正在努力加入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以致力于实现大学学位互认和课程学分互换。很难想象为什么欧盟成员国或它的一所颇负盛名的大学愿意让它授予的学位与被质疑腐败的大学或大学体系所授予的学位等价。另一方面，欧洲品质保证局注册中心（The European Quality Assurance Register）和其它机制可能会把反腐败实证作

为欧洲评审流程的标准。因而，该流程本身可能会成为一种清除高等教育腐败问题的方法。

另一方法与投资高等教育的发展援助机构有关。这些机构可能会重新思考是否投资给被认为高度腐败的大学体系。然而，有效的政策干预需要获取腐败的相关经验和成本信息。常规的学生和教员社会调查会很有用。事实上，对一所大学的学生和老师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将显示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下降。这说明，当人们意识到腐败现象有可能被暴露、会造成羞耻感时，发生腐败的可能性便降低。

通识教育的全球视点

Patti McGill Peterson

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 (the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副研究员

电子邮箱: ppeterson@ihp.org

人文科学 (liberal arts) 在高等教育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从古希腊罗马人文科学发展的萌芽时期, 到中世纪大学的课程实体, 到十七世纪哈佛学院的课程, 人文科学都是西方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十九世纪后期, 以人文科学学习为基础的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又称博雅教育, 日渐衰落。其原因同样来自西方内部: 德国新兴的大学模式更多地把重点放在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上, 而不是本科教学, 这就挑战了通识教育的地位。截至二十世纪中期, 由于学术专业化, 更多新的科目要求在曾经由古典语言、文学、历史、宗教信仰、数学和基础科学少数科目混合的课程中占据一席之地。克拉克·克尔 (Clark Kerr) 曾在哈佛大学 1963 年的戈德金讲座 (Godkin Lectures) 中说, 研究的重要性将逐渐凌驾于本科教育之上, 自然科学学科会获得更多的资助, 而人文学科会因此被削弱。他还提醒说, 结果就是课程之间的连贯性遭到损害。

西方国家保持通识教育的活力

克尔的预测在大学得到了应验, 连致力于本科教育的文理学院也受到来自研究生院的复杂的知识部门化的影响。因此自二十世纪 60 年代以来, 美国高等教育界一直对本科教育课程问题争论不休。关于通识教育内容的争议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埃里克·赫什 (E.D. Hirsh) 在其 1987 年出版的《文化素养》

(Cultural Literacy) 一书中主张回归西方思想的狭义教义, 类似的想法将这场讨论推向新的高潮。有些人警告说, 这样的思潮可能会导致文化认同降低、文盲学生数量增加, 也可能导致通识教育急剧发展, 但也有人指责说这样的发展趋势会导致精英主义、文化霸权及课程内容死板。不过无论双方意见分歧有多大, 大家都积极一致地认为: 本科教育很重要, 需要认真设计课程以拓宽和加深学生的学习。

尽管关于通识教育课程究竟教什么科目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但是美国的教育家已就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达成一定的共识。美国高校联合会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代表其成员指出, 通识教育不仅应该为学生提供广泛的科学、文化和社会知识等全面教育, 还要帮助学生在其感兴趣的专业领域深入学习; 通识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还要让学生牢固并灵活掌握理论和实践技能——例如沟通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将知识技能应用于现实世界的能力。

美国被视为通识教育的大本营, 但是美国的高校一直以来不得不应来自学生和家对功利教育越来越大的需求。人文科学的课程要与应用性较强的课程进行角力, 如商业管理。在欧洲, 早期的专业教育打败了通识教育。虽然存在一些历史悠久的通识教育机构, 如巴黎美国大学 (American University

of Paris),但是在人文科学的发源地,通识教育的新生命仅在过去十余年间闪露过一道光芒。荷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荷兰为大学系统新建了8所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现今,波兰的公立大学中也在实施通识教育运动,很成功,声势也越来越大。德国的柏林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伯拉第斯拉瓦也新建了若干文理学院。随之欧洲文理学院联盟也成立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大学只在欧盟地区招收少数学生。

其它地区的通识教育发展

通识教育正在其发源地以外的地区蓬勃兴起,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在外部支持下建立的,不再单单是本土自身的事业。美国曾经在非西方国家建过文理学院。早期建立的两所文理学院是1866年建立的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ies of Beirut)和1919年建立的开罗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ies of Cairo)。这两所大学已经扎根于中东,多年来为当地培养了大批的精英分子。最近的新一轮行动中,新加坡国立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刚刚宣布,该校将与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合作为新加坡高等教育引入文理学院。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也已经在阿布扎比酋长国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文理学院。巴德学院(Bard College)也在俄罗斯、中亚和巴勒斯坦,与当地的合作伙伴一起开办了一些通识教育机构。亚洲女子大学(the Asian University for Women)是孟加拉通识教育的前沿。通过以上这些例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通识教育正在向全球迁移。

对于大部分非西方国家,包括那些早先引进过通识教育的国家而言,通识教育现在仍是一个舶来的概念。例如,尽管开罗美国

大学取得了成功,但其在向埃及庞大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引入通识教育方面却影响甚微。虽然美国本科教育很强,但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者而言,最具吸引力的是研究生教育和研究。人们认为,没有足够的缘由去了解本科教育的性质,因此也没有什么动力去理解通识教育的意义或者构建通识教育课程的方法。此外,世界银行等捐赠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规划中非常重视劳动力培训和市场经济的研究,这也进一步把通识教育推向边缘。

发展中国家的通识教育能否独立发展并推广给更多的学生,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近来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动向值得关注。中国在本科教育课程改革中非常重视通识教育的内容和元素。波兰在持续苏联时代强调专业课程特色的同时,其通识教育发展也极富生命力。印度和土耳其两个国家虽然都不是通识教育发达的国家,但其中的一些大学也在试图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南非的新发展也令人期待,其高等教育部最近发起了一项人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计划,目的是打造更强的人文教育和研究,以期帮助南非从种族隔离时代转型。可惜的是,这些都只是个别情况。那些在高等教育改革上艰难前行的国家可能更倾向于在课程以外的问题上投入精力,例如入学机会问题和财政问题。由于资源限制和扩招压力,这些国家究竟能否把通识教育纳入教育改革中仍值得怀疑。

包含通识教育的课程改革将要求就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首屈一指的问题是,学生的个人发展和才智发展,应与为其工作做准备同样重要。因此,本科教育及其质量和教学方法作为教育的要素,必须被视为高等

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条件。通识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帮助学生掌握广泛的生存技能和可转换的分析技巧，更为重要的是

培养高素质的公民，这也是国家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

国际高等教育中的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国际高等教育领地上漂浮着一个幽灵，那就是数目急剧增加的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它们的工作是在留学大国为特定的大学招生，同时提供留学咨询服务。为了促进招生工作，许多国际学生接收国的官员担任一些院校负责招生的领导，特别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尽管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趋势，但随着国际学生成为一些大学发展的强制要求，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正在大量涌现，同时丑闻也纷至沓来。当然，这些机构的经营者并不是在做公益，与之合作的大学一般会根据招生数量向他们支付一定的酬劳。令人震惊的是，申请求学的学生也为他们付费。

本文的一个简单观点是，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正在降低大学的学术标准和诚信，应该被取缔或者大幅缩减。为潜在的学生提供信息是好事，但是招生过程中不应该有金钱交易，大学也不应该把招生这一关键的大学责任和学术权力假手海外中介或代理公司。

旧的方式和新的高潮

30年前，大多数对出国求学感兴趣的学生会自己查找他们喜欢的大学的信息，然后递交申请入学。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人们可以写信给国外大学直接获取信息；在一些受到苏联、英国、法国和美国支持、资助的发

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大使馆资助的图书馆和主要城市的信息中心获取信息。当时国际流动的学生数量相对较少。1981年，全球流动的学生只有91.23万。过去30年间，这一数字增长了3倍。许多学生来自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家庭，能够获得信息并在全面的信息基础上做出选择，其中一些学生还受到政府或其它机构的资助。那时候，国际学生接收国的大学很少将“国际化”作为战略之一，几乎没有大学指望从海外学生那里赚钱。冷战政治和新殖民主义关系刺激了主要大国资助海外信息中心的行为。

现在，这一环境已今非昔比。的确，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里，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看来十分古怪。高等教育是一个涉及300万国际学生的大市场，大部分国际学生来自亚洲，留学目的地是西方一些主要的英语国家。美国已经接收了67.1万外国学生，占全球国际学生总数的21%，这些国际学生给美国经济贡献了176.5万美元。国际学生为其它主要国际学生接收国所作的经济贡献更大。

环境的主要改变包括互联网的兴起、国际学习的商业化、出国求学从精英教育转变成大众化教育。以前，国际学生主要限于少数精英分子，并且能够获得国家资助和求学国家的奖学金。现在情况不同了，出国学习现在已是一个大众选择，求学开销主要由学

生或其家庭自行承担，学生也来自更广阔的社会阶层和更多的国家。

互联网使获取高等教育相关信息变得十分方便，但是许多大学的网站都缺乏信息透明度，甚至提供错误的宣传。“文凭工厂”大学的网站也能被设计得像牛津大学，甚至直接偷牛津大学的图片。不过，那些有能力辨别事实和谎言的人还是能够获得有益信息的，尽管这并不容易。

1990年冷战结束，许多东道国取消或者削减了设在海外的信息中心。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有意地将国际学生的招生商业化。澳大利亚政府为此设立了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开发署（IDP agency），力图将高等教育打造成一项出口产业。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正在积极地将国际高等教育商业化。

与此同时，美国不顾后果地削减海外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的预算后，面临的是对重新开放信息中心和图书馆、重新展开对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推广品牌和开拓市场的昂贵投资。

随着海外学生数量的增长，申请者的家庭地位已经下移。曾经，少数申请者主要只对海外顶尖大学感兴趣，但是有一些政府资助项目针对的是在不那么卓越的大学里求学的学生。今天，许多想出国留学的学生对高等教育预期知之甚少，仅仅因为在本国都没有学校收而出国读书。此外，学生也认为海外文凭在某种程度上会改善他们的工作前景或者成为移民的跳板。

越来越多的大学已经加入争夺国际学生的竞赛行列。大多数新进成员并不是顶尖的“名牌”大学而是没那么有名的各类学校，有时还是低质量的教育机构。当这些学校觉得自己没有方法吸引其他国家的学生时，它们求助于第三方招生机构。令人诧异的是，

一些相当值得尊敬的美国大学也求诸于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可能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实力和品牌吸引海外学生没有足够的自信。那些名列前茅的大学仍然更青睐最好的和最聪明的学生，但是它们能够提供的名额相比于申请者数量而言太少了。

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登场

新的环境造成了信息和入学机会真空，这些真空需要被填上。不幸的是，这个问题被以最坏的方式处理了。许多力图吸引国际学生的大学，特别是那些没有国际形象的大学，发现自己不能顺利进入潜在的市场。学生们发现，要在繁杂的网站上，在报纸、火车站和发展中国家的其它地方能够找到的五花八门的广告中，找到可信的信息和定位申请目标十分困难。互联网某种程度上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因为互联网并不能自行区分质量，提供的是未经评估和没有过滤的信息。至今也无法评估信息的质量和准确性。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在这个信息过量的环境中粉墨登场，并声称能给为互联网和其它渠道获得的信息提供路标。

真实情况

如果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仅提供信息，就不会演变成如今的危机局面。信息评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是一个难题。当然，这些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的主要客户是欲招收学生的大学和其它高等教育服务的提供者。中介不是信息提供者，而是推销员。他们的目的是卖出产品，他们会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对于潜在的申请者，他们不提供多种选择或客观指导。尽管确切数量未知，许多资质不详的经营者却拥有实际招生的授权。一些最不负责任的中介收受两方的钱——

学校或学校所在的国家以及申请者的钱——这是明显违反职业道德的。大多数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都是独立的经营者，并和一个或者多个海外大学订了合同。这些大学往往名望较低，国际名气很小，并且通常对国外学生有巨大的经济需求，以维持其学校基本运行。

美国联邦法律禁止在招收国内学生时收费。因此，为什么大学付钱给中介“进口”国际学生就合适甚至合法，这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没有一定的资质标准，也不受任何监督。现在人们正在努力对这一新的“行业”创造“标准”，但却没有办法衡量经营者违规违纪的行为。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是国际教育行业最大的协会之一，经营者要加入不需要回答任何问题就被赋予了一道体面的光环。其他组织，例如美国大学注册和招生人员协会，已经对自身的角色提出了严格的标准。当前，一个新的名为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 Council）的组织正致力于建立标准以及把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合法化”。

解决方法

要应对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很简单：取缔它们。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在国际高等教育中没有合法的地位。它们是不必要的，并且常常不够诚信，不能给潜在的学生提供

正确的信息，也不能给招收国际学生的大学提供所需的信息。

大学和学生都需要客观准确的信息和指导。互联网能够提供这些资源，通过一些由受尊敬的大学认可或通过一个相当可靠的国际或地区组织的网站获取信息会更好一些。如果那些取消或减少了海外信息中心和图书馆的大学重建这些机构，也会有帮助。成本并不高，但其能提供的善意和可靠的信息将非常多。那些不从大学收费、与大学没有联系、提供信息并帮助学生申请的独立咨询机构也可能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事实上，一个新的名为国际研究生招生顾问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Admissions Consultants）的组织已经成立并开始强制实施相关标准。

国际学生接收国的大学应该立刻停止雇用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大学自身应该更有效地为潜在的申请者提供更好更多的有用信息。要达成这一目标，大学招生人员可能需要抱着信息共享的目的实地走访海外的潜在申请者。

国际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弊端被中介和第三方招生机构大大恶化了。现在正是取消这些机构的时候，并用开放透明的信息渠道替换它们。招生的程序应该回到以前，即让学生各自根据提交的可靠申请，选择他们最适合的学校。

五个关于国际化的谬传

Jane Knight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安大略教育研究所 (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兼职教授

电子邮箱: jane.knight@utoronto.ca 或 janeknight@sympatico.ca

随着国际化的日趋成熟, 国际化正在变成一个更重要、更复杂的过程。然而, 它也正在演变成为一个更加令人困惑和误解的概念。国际化绝对已经过了“本月最受欢迎的”阶段, 现在它被牢牢地嵌入大学使命宣言、政策战略, 以及国家的政策框架之中。由此可见, 国际化已经步入新的阶段, 成为高等教育政策、实践和研究的合法领域。然而, 由于国际化引人注目的高姿态, 它现在被用来形容任何与世界范围的、跨文化的、全球的或国际有关的事物。简言之, 它现在是一个语义混杂的词, 正在逐渐丧失它的本意和方向, 这些年来国际化的前提已经发生了改变, 也许现在需要曝光和讨论国际化的相关谬传了。以下简要介绍5个广泛传播的观点。

谬传一: 国际学生代表国际化

一个长期存在的谬传是, 校园中的外国学生越多, 他们带来的国际化的校园文化和课程就越多。然而, 尽管这是大学的期望, 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许多大学中, 国际学生觉得自己在社交和学术上被边缘化, 并且常常感受到民族或种族关系的紧张。通常情况下, 除非是大学或教师推出的特殊课程, 本国的本科生会拒绝参与有外国学生的学术项目或和外国学生交往, 至多也只是对此保持中立。国际学生倾向于团结起来,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尽管国际学生没有很深地融入

东道国的文化, 但是与当地学生相比较, 国际学生在校园里有更广泛和更有意义的跨文化体验。当然, 不是所有大学都是这种情况。但是, 对于一般人们认为招收国际学生的首要原因是帮助校园国际化, 现实提出了异议。尽管意图是好的, 但事实并不以那种方式应验; 相反, 这一意图还掩盖了其他动机, 例如获取收入或者渴望在全球大学排行榜上提高排名。

谬传二: 国际声望代表了教育质量

第二个谬传是基于这样的信念: 一所大学的学生、教师、课程、研究、协议和合作网络的国际化程度越高, 其声誉也会越高。这样的信念和第二个谬论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国际声望高代表教育质量好。对于高度依赖国际学生带来的收入和品牌价值的大学, 它们在招生和毕业标准上的问题证据确凿地表明, 国际化并不能提高教育质量和标准。由于大学对全球或地区大学排名的追求, 如《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或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问题变得更复杂了。排名能否准确测量一所大学的国际化程度, 以及更为重要的是, 国际化程度是否能够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 这都非常令人质疑。

谬传三: 国际间的大学协议

人们常常认为, 国际协议的数量以及合

作网络中国际成员的数量越多，这所大学对其它大学和学生来说就声望越高、更有吸引力。但是实践表明，多数大学不能管理或者受益于 100 多个协议。要保持活跃、有效的合作关系，要求每一个教师、学院和国际事务办公室在人力和财政上给予投入。因此，国际合作伙伴的长长列表通常只是反映了纸质协议的名称，而不是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因此，数量的重要性又一次超过了质量，国际协议名单也更多地被当做地位的标志而不是有效的学术合作。事实上，最近的趋势是把协议合作的大学数量削减到 10~20 所大学，形成更全面、更可持续的关系；不过这也会导致教师和研究人员对自上而下推进的国际化以及压缩个人的国际研究或课程兴趣形成不满情绪。

谬传四：国际认证

当前，来自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国家外部质量保障机构的国际认证或者专业工程和商业认证的机构，广受全世界大学的好评。导致第四个谬传的起因是，大家认为一所大学通过的国际认证越多，这所大学的国际化程度越高，那么学校也越好。这是非常不对的。国外对质量的认可并不体现大学与公立机构或私立机构之间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国际活动的规模或价值。

谬传五：全球品牌推广

第五个谬传与一个错误的假设有关：大学国际化的目的是提升大学的全球品牌或地位。这把国际市场推广和国际化混在了一起。

前者是推广品牌，后者是把国际化、跨文化和全球维度融入大学目标、教学、研究和服务功能的战略。全球品牌推广活动的目标、预期结果和投入，与学术全球化的要求是不同的。因此，谬传就变成国际市场推广计划等价于国际化的计划。不过，此处不可否认的是，一项战略性的成功的国际化议程能够争取到更大的国际知名度。但是，这一点并不是国际化的目标，而只是国际化的副产品罢了。

以上谬传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国际化带来的利益或者国际化的程度都被量化了，如国际学生、外国教师、大学协议、跨国教育项目、研究计划、外国认证、分校区等的数量。尽管尝试将国际化的结果量化为关键绩效指标可以帮助达到责任要求，但是这并不能反映那些带来国际化重要利益的学生、教师、研究人员和团队关键的、无形的绩效。

总结

以上五个谬传并不适用于所有的高校或者所有国家，但是它们的确反映了非常普遍的误导性假设。当然，关于国际化还存在其他谬传以及其他一些基本事实，也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识别和反思这些谬传和事实的一个目的是保证国际化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另一个目的是当高等教育经受来自竞争、排名和商业化这些混乱的考验的时候，我们能对那些有意的和无意的后果了如指掌。

国际化的终结

Uwe Brandenburg 和 Hans de Wit

Uwe Brandenburg: 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 (the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电子邮箱: Uwe.Brandenburg@che-consult.de;

Hans de Wit: 荷兰应用科技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经济管理学院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教授

电子邮箱: j.w.m.de.wit@hva.nl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已经从大学所关注的边缘问题转变为大学所关注的核心任务。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 可以称之为国际化的活动常常既不叫这个名字, 也不能帮助大学抬高声望, 而且不同的活动之间并不相关。国际合作研究是一个例外, 但是国际合作研究从来没有正式成为国际化潮流的一部分。80年代末期, 新的变化出现了: 国际化的概念诞生并迅速发展, 其重要性也不断增加。二十年来, 这一多维度的体系中加入了新的要素, 简单的学生交流演变成招生的大产业, 只在非常小众精英的范围发挥影响的活动演变成大众选择。我们认为, 现在是时候对国际化的概念发展进行批判性反思了。

从本质到形式

随着国际化进一步发展, “为什么”推进国际化的问题已逐渐被“如何”国际化所代替, 即如何进行学生交换、如何推进学位互认, 以及如何促进学生就业等。即使是90年代末的“国内国际化”运动, 其功利性的表现亦越发强烈。

“国际化”与第二个术语“全球化”是同时发展的。事实上, 两个术语之间相互联系, 所以无法明确区分它们。今天, 国际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救星, 被视为需要被守

卫的道德基础以及公正公平的象征。高等教育界仍然深信, 国际化必然会促进和平与相互理解, 比如50年代富布莱特奖学金 (Fullbright) 产生的驱动力。

尽管高等教育国际化正在获得道德影响力, 但其内容似乎已经变质了: 这一形式丧失了它的本质。国际化已经成为“有用”的同义词, 人们不那么质疑它作为一个“改进教育或研究质量的工具”的有效性和重要本质。

国际化的贬值

另一方面, 现在全球化含有一些负面含义, 并且被认为比国际化更具杀伤力。这一准则视国际化为“好”, 视全球化为“坏”。人们声称, 国际化是人道主义思想的最后一个代表, 对抗由全球化这个名词代表的纯粹经济利益。国际化和全球化之间形成的刻意对立却忽略了一个事实: 与全球化概念相联系的活动 (如高等教育被作为一个可以交易的商品) 不断在国际化的旗帜下发生着, 比如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亚太高等教育协会 (The 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以及欧洲高等教育协会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的论坛上提出的高等教育越来越商业化。

国际化：从创新回归传统

实际上，这一态度加剧了国际化的贬值，使得保护措施形同虚设。如今，人们倾向于拥护国际化而不是做国际化的先锋，我们不再是创新的先锋，而成为了传统的守卫者。这导致妄自尊大或自卫性的自我知觉危机：尽管周围的世界奔涌向前，却仍然牢牢坚守传统观念，并依其执行。我们，包括两位作者，都哀悼真实流动性的丧失和高等教育的商业化，以及其它国际化的成分。然而，我们也忽略了一些新的发展，例如数字公民的出现——对这些人而言，流动性至少和真实世界一样真实。

后国际化时代——新的黎明？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重新开始积极的行动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呢？重点如下：

1、我们必须抛弃教条的和理想主义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概念。

2、我们应该理解国际化和全球化最纯粹的意义——它们不以自己为目的，而是自身为达到目的的方式。

3、我们必须摆脱无知并扪心自问：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些事情？在一个知识全球化的社会，它们能对教育和研究质量的目标有何作用？我们也必须把握流动性和其它活动的

真实面目：它们是活动或者工具，而不是以自身为目的。

4、我们应该认真权衡各种预设的工具和方法，而不是在理论基础和结果上浪费精力。

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哲学思考，还需要对现实更敏感。我们不能继续假定某些类型的流动性和一些国际活动（如交换学生和出国留学）天然的就是好的，其他类型（如招生和跨国教育）都是坏的。我们应该深入分析、构建新型的价值和理论基础，并确保我们真正能达到这一有意义的目的。

高等教育的未来是全球性的，而我们的工作帮助高等教育界做到有备无患。因此，我们需要那些理解并明确自己在地球村的作用的人；我们需要超越国界，需要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如权利和入学机会平等、发展教育和研究等等。但是，本质上，我们需要重申大学的核心地位：大学要帮助人类了解世界，改善与世界的关系。我们要求大学之间、人与人之间就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将怎样在一个全球村中居住和工作达成一个共识。我们可能必须放弃旧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概念，转向一个新的无偏见的范式。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反思和重新界定我们所看到的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方式。

非洲高等教育：二十世纪的起伏

Goolam Mohamedbhai

非洲大学联盟 (the 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 前秘书长、毛里求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auritius) 前校长

电子邮箱: g_t_mobhai@yahoo.co.uk

几个世纪以前，当欧洲人还没有到非洲大陆时，非洲已经有高级学习机构了，例如摩洛哥非斯的卡拉维因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l-Karawiyyin)，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 (Al-Azhar University)，以及马里的廷巴克图大学 (University of Timbuktu)。然而，非洲的现代高等教育是在欧洲殖民时期的学校和那些附属欧洲大学的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一开始，这些机构就是仿效欧洲高等教育体制的。这些学校的教师都是欧洲人或在欧洲接受教育的非洲人。大学的主要目标是应对迅速发展的中等教育、为公共部门训练人才以替换殖民地时期的教师员工。上世纪60年代殖民地独立以后，这些高校成为自治的大学。它们的学术结构、治理模式、课程和教学方法又一次以欧洲大学为蓝本。这些大学都用欧洲语言教学，几乎不使用当地的语言。学校都建在主要城市的郊区，专为非洲的精英而设，并且远离农村地区。然而非洲大部分的人口都住在农村，在农村发展高等教育的挑战也是最大的。因此，也难怪这些高校与非洲独立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经常被质疑。

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非洲的大学因受到自己政府和欧洲政府的慷慨支持而蓬勃发展，并继续和西方世界，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的大学，保持亲密的关系。它们很快就发展成欧洲大学标准下的卓越中心，例如乌干达

的马凯雷雷大学 (Makerere University)、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 (University of Ibadan)、塞内加尔的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 (the University Cheikh Anta Diop)，以及苏丹的喀土穆大学 (University of Khartoum)。新大学一旦创建，就主要仿效这些已有的大学。

政治、经济混乱

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后期，非洲经历了一段社会动荡的艰苦岁月。非洲国家的经济被严重破坏，这使得政府很难继续投资高等教育。外部结构强制调整的措施之一，即预算削减，使得高等教育财政步履艰难。大约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主要的政治危机，这些危机通常由种族或部落纷争引起，有时也因为非洲国家卷入东西方的冷战而爆发。政治危机导致许多非洲国家治理不良，一些甚至变成了政治高压的独裁国家。非洲的大学由于继承了西方学术自由的理念，当时便毫不犹豫地开始批评政府，因此很快被视为政治反对派的温床，这必然导致政府对大学事务更多的介入。其结果就是，许多非洲大学的学者被迫流亡到北半球的国家。例如，在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大学，几位顶级学者消失不见，据传是被总统伊迪·阿敏 (President Idi Amin) 杀害，其它的学者也在逃亡途中。在这种形势下，这所著名大学不得不被迫屈服。

投资回报率

与此同时，由于之前采取积极措施改善了初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小学和中学的毕业生数量开始大幅上升。这对非洲的大学造成了巨大的扩招压力。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许多非洲国家进入和平年代，这些国家的大学开始回应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并且向政府寻求急需的支持。

也就在那时，另一个打击从天而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高等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率比基础教育低。虽然这个结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当时这些发现都影响了捐赠人和发展机构对非洲政府的支持。这些政策的变化和影响可以从世界银行全球教育部门的高等教育支出额度看出来：1985年至1989年间是17%，1995年到1999年下降到7%。因此，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学忍受着被遗弃和资助不足的痛苦。

凄惨的境遇

在二十世纪90年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多数大学境况凄惨。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演讲厅、图书馆、实验室和学生宿舍，都急需新建和修整，以满足大量涌入的学生的需求；而学生的数量又多到它们容纳不下的地步。在饱受人才流失之苦后，这些大学急缺合格的教师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课程也

过时了，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包括新兴工业和商业部门的需求，这导致毕业生的大量失业。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传播和应用也不广泛，使得这些国家不能得益于在世界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信息技术革命。

然而，尽管被自己的政府忽略，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障碍，非洲的大学仍展示了它们的活力，并幸存下来，学会了怎样在这样甚至更糟糕的条件下发展起来。

转折点

非洲大学的命运转折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举行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UNESCO World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会上发表的宣言强调了高等教育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的重要作用。会议呼吁工业国家的大学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兄弟院校。这形成了一个高等教育复兴支持框架，并引发非洲大学开始于21世纪初的振兴。值得注意的是，非洲获得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帮助从1990~1999年这十年间每年的1.1亿美元提高到2000~2005年的每年5.15亿美元。

作者注：本文改变自作者的《非洲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一文，将出版于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出版的《高等教育论坛》（Higher Education Forum）刊物。

埃塞俄比亚：私立高等教育和地区间不平等

Tilahun Gidey 和 Pedro Teixeira

Tilahun Gidey: 埃塞俄比亚巴赫·达尔大学 (Bahir Dar university) 心理学讲师

电子邮箱: tilahun2000@gmail.com;

Pedro Teixeira: 葡萄牙波尔图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Porto) 经济学副教授

电子邮箱: pedrotx@fep.up.ptom

直到不久以前, 埃塞俄比亚的高等教育仍然保持世界最低的入学率, 因此仍属于一个精英教育体制。20世纪90年代初的政治改革带来了教育改革, 包括引入私立教育。

迅速扩张

在过去十年里, 埃塞俄比亚教育系统的入学率实现了重大飞跃。各级教育的入学人数都有明显的上升, 尤其是女性入学人数有了大幅度增长。1999~2008年间, 小学入学率增长了237%, 中学入学率增长了263%, 高等教育的增长率最高, 达到846%。私立教育为各级教育入学人数的扩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阶段。目前, 埃塞俄比亚有56所私立高校提供本科学位教育, 其中一部分已经通过了认证。2007~2008学年, 私立教育快速扩张, 私立高校的入学人数占到高等教育总入学人数的16.9%。私立高等教育的扩张也可以从毕业生数量变化上观察到: 私立高校的毕业生占全部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比例从2003年的2.4%增长到2008年的18.1%。

由于私立高校在埃塞俄比亚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公共部门的财政支持, 这一扩张就格外引人注目了。私立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学费, 与这个国家的平均家庭年收入相比, 学费还是相当高的。私立高校的人均学费约为每年231美元, 占平均家庭年收入的24.8%。

参考该国的低储蓄率, 这一财政支出也相当大了。

鉴于几个报告都将入学机会和公平列为埃塞俄比亚最严重的教育问题, 因此上述财政压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人们期待那些高等教育问题可以通过教育多样性来有效解决, 如拓展教育的地理覆盖。此外, 私立教育的发展被视为对改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地区平等 (特别是农村地区) 做出了积极贡献。

私有化和地区覆盖

伴随高等教育的扩张, 政府也试图在每个地区建立至少一所大学。目前, 在埃塞俄比亚的11个州和行政区里, 有8个州都已建立公立高校。有3个州没有任何公立高校, 不过这3个州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6%。另外, 有三个州的大学高度集中, 拥有全国80%的人口。当我们审视私立教育时, 情况更令人惊讶 (虽然全球总体上也是这种情况): 在已有的56个私立大学中, 41所位于政治和经济首都阿迪斯阿贝巴, 其余的高校散布在其它地区。一些地区由于缺少合格的教师或该地区对大学课程的需求很低, 导致其教育项目的数量有限。

尽管私立教育在阿迪斯阿贝巴高度集中, 也有几所总部设在那里的大学也在其它地区建立分校, 因此私立教育系统的覆盖面要比以上数据反映的更为均衡。这些结果也

表明高校扩张的模式，即高校扩张是从首都发展到其它地区的。另一方面，虽然部分大学在不同地区提供学位教育，但是85%以上的学校都坐落在那些地区的中心城市。

埃塞俄比亚的私立教育前十年的扩张表明：和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私立教育的区域性扩张主要取决于市场因素。不过，埃塞俄比亚的首都现在似乎成为新大学设立总部的主要平台，同时一些大学正在向其它地区扩展挺进。尽管私立高校高度集中在部分地区，但现存的问题和可改进空间都可能会激发私立教育发展，并为其提供不同的发展途径。

政府的监管权力者将以什么态度来对待私立教育的扩招以及其地区多元化问题，这值得关注。这对于那些以市场为导向的大学来说更加息息相关，因为这些大学似乎不受社会和政府的信任。最近的一些迹象显示出它们面临的问题。2010年8月末政府就颁布了一份文件，要求所有大学停止远程教育招生，私立大学禁止在师范教育和法律教育项

目中超额招生。这些决定从质量的角度看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许多私立大学很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

结论

就像其他国家那样，埃塞俄比亚私立教育的扩张似乎在走向一个不同的而且需求更大的阶段。未来几年，埃塞俄比亚的国家质量保障司（National Quality Agency）有望对私立高等教育进行质量评估。这个评估过程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尤其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评估应该如何平衡院校的多元化，还是简单地把同一标准应用于所有院校。由于私立教育常常在规模、种类和学术实力上呈现明显的多样性，如何选择评价标准一定会对埃塞俄比亚的私立教育发展产生不小的影响，特别是在那些更缺乏合格教师的欠发达地区。未来几年，私立教育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处理地区多元化的问题还不得而知。

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一路下滑

Simon Marginson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高等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箱: s.marginson@unimelb.edu.au

在澳大利亚的大学里, 超过 1/4 的学生是完全自费的国际学生, 教育是这个国家继煤炭、铁矿石和黄金之后的第四大出口产业。过去二十年里, 国际学生数量以每年 12% 的速度显著增长。像美国一样, 澳大利亚招收许多中国学生, 包括香港学生。

澳大利亚, 一个拥有 210 万人口的中型国家, 却在全球国际教育市场中占到了 6% 的份额。澳大利亚研究型大学里的外国学生数量超过美国所有博士生项目中的外国学生数量总和的一半还多, 而美国的人口总数是澳大利亚的 16 倍, 这着实令人惊讶。严格地说, 这在过去着实令人惊讶。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的经营模式长期以来被其他国家所关注, 被看作是教育市场发展潜力的代表, 也是发展极限的代表。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市场压倒规则, 经济不断繁荣, 似乎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然而在市场主导的世界中, 繁荣之后接踵而来的却总是破产。

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已陷入了困境, 而且这样的衰退很可能涉及面广, 持续时间长。此次衰退并非由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次贷风波触发。在亚洲经济增长的带动下, 全球对国际教育的需求依旧稳健。问题出在澳大利亚本身的体制, 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政策导致的。

预计澳大利亚明年的高等教育国际招生数量将大幅下降。对于那些平均 16% 的收入

来源于此的高校而言, 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某些学校和教育机构对国际教育的依赖更甚, 其国际教育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甚至超过了 20%。

值得注意的是, 国际教育的衰退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经济影响。超过 12.5 万雇员工作在服务于国际教育的各行各业中, 如住房、零售、医疗、保险、旅游、通信与信息技术、影视娱乐及移民服务。对于墨尔本中心地区和悉尼的某些地区而言, 国际教育的形势对其经济发展尤为关键。

国际学生人数下滑

职业学院和英语语言专科学院的国际学生数量已经下滑。2010 年 7 月, 所有院校机构的国际学生新生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2%。其中, 来自印度的学生减少了 80%, 来自泰国、越南和香港的学生减少了 20%。有关数据显示, 2011 年初的签证新申请数量与以往相比下降了近 20%, 并证实各大高校确受影响。国际学生人数下滑的态势已经扩及到澳大利亚国际学生主要来源国——中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澳大利亚教育的供需双方都呈现退化趋势。然而主要起因在于供给一方出现的变化。令人惋惜的是, 澳大利亚的受欢迎程度也已大不如前了。

两年前,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首次出现了困难的迹象。当一系列伤害到南亚学生的暴

力攻击登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新闻头条，澳大利亚当权者却反应缓慢，因而受到印度媒体的强烈抨击。之后，澳大利亚政府严厉打击了长期存在的“移民诈骗”，这些诈骗通常是由私立培训学校与印度某些教育机构串通合谋的。澳大利亚教育对印度学生的吸引力更是直线下滑。

当地反对移民

然而，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产业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选民近年来越来越反对来澳移民。

和美国、加拿大、南美部分地区一样，澳大利亚是高度移民化的国家。然而，对移民的政治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民意调查显示，如今五个澳大利亚人中有四个均表示澳大利亚接收了“太多”的移民。在北部城市布里斯班和悉尼，反对移民的声音最为强烈。那里由于长年以来对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不够，交通、供能、水利等其他公共服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近期澳大利亚联邦选举中，两个党派都意识到布里斯班和悉尼的选民将决定选举结果。反对党民族党自由党联盟公开许诺将把净海外移民数量减少40%，而执政党工党已经采取措施努力实现该目标。

持有临时签证的国际学生数量是永久移民的两倍，因而想要大规模减少海外移民只

能通过减少向国际学生发放签证来实现。

政府不仅减少来澳学生数量，还对已毕业的国际学生申请转为永久移民进行限制。准确数据难以取得，但据估计大概有40%的国际学生试图获得永久居民权。

移民局对学生签证的发放控制得更加严格。签证申请期延长，有些甚至要持续3个月以上，许多学生还不得不去别处办理签证。此外，由于工作经验和语言考试的限制，毕业生较以前更难获得永久居住权。技术移民引进也减少了。移民部部长有权对特定国家的移民数量进行带有歧视色彩的区别限制。所有变化说明国际学生和移民在澳大利亚不那么受欢迎了。而这又反过来引起对澳大利亚教育需求的减少，正如签证申请减少所反映的那样。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方面十分清楚政府移民政策的改变将对国际教育产业产生严重后果。选举之后与正式组成新政府之前的这段时间的延长更是使问题恶化。然而没有人来承担相关的政治责任。

如果政策不变，今年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的数量预计会下滑40%~60%。澳大利亚在全球的国际教育市场份额将流失到其他英语国家。由于政府资金的缩减，英国和美国的大学在扩大国际学生招生规模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澳大利亚：商业化的危险

Philip G. Altbach 和 Anthony Welch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Anthony Welch: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箱: Anthony.welch@sydney.edu.au

二十多年前，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将高等教育发展为产业。自此开始，高等教育成为该国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政府预算的削减刺激高等教育行业利用国际教育来赚钱，预算中削减的部分由从国际行业活动中获得的大量收入来弥补。尽管学生和教师的国际化越来越普遍，国际化项目的初衷也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国际化的主要目标已变为赚钱，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下拨资金不足导致的。

政府施压

在政府鼓励将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政策刺激下，在用国际学生教育收入替代政府拨款削减部分的政策推动下，高等教育行业积极响应，采取各种自发行动。澳大利亚大学国际学生招生规模大幅膨胀，向国际学生收取高额学费产生的收入也大幅增加。各大学还制定了一系列海外规划，包括在越南、南非、新加坡等地建立分校，在马来西亚等地实施与各类教育机构和企业合作的计划。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 (The 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越南分校计划到2012年招收1万名学生，而今年已经多招收了120名国际学生。莫纳什大学 (Monash University) 在马来西亚的分校已经能授予医学学位，如今招生规模超过4000人，配有400名教职员。

国外分校的国际学生招生规模扩大是所有类型国际学生招生中最快的。

澳大利亚政府也通过向国际分校提供资金参与合作。更重要的是，政府放宽发放签证和其它移民政策。这项政策使得国际学生能更容易到澳大利亚留学并在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

显现的新问题

从金融视角来看，该项政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教育服务成为澳大利亚最主要出口产业之一。官方数据估计现澳大利亚国际教育总收入约155亿美元 (大多数来自高等教育)。然而从学术视角来看，高等教育体系中很快出现了各类问题。在海外，澳大利亚学术机构的分支机构的质量和道德受到质疑。莫纳什大学在南非的分校就遭受质疑，而在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分校由于获得当地政府的有力支持，所以成功得多。有些分校已经失败，如新南威尔士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在新加坡的分校每年办学成本多达数百万美元，却无法吸引足够数量的学生，最终退出新加坡。

许多低端竞争者也进入市场。当创收成为国际高等教育主要驱动力时，便常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私人行业，许多小规模的美

发和烹饪职业学院通过承诺短期内颁发证书和毕业后安排工作（有时是编造的）吸引了许多国外学生，尤其是来自南亚的学生。持有边境资格证的学生开始涌入，其中有些学生被印度的骗子教育机构的夸大其辞所蒙骗。在墨尔本和其他地方爆发的反南亚偏见加剧了国际学生的安全问题，并在印度引起一场爆发性的批评，异常轰动。然而近期一项对来自10所大学的1600名国际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学生认为相比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澳大利依旧是最安全的求学之地。由于警方和政治人士试图将这些袭击认定为概率事件而非种族主义事件，在这方面的不当处理加剧了袭击带给国际学生的难题。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已经宣布成立一个调查组来调查国际学生所遭受袭击的形式和程度。

其他问题也层出不穷。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是该国最具吸引力的国际大学，但被指控鼓励学生在考试中作弊。新闻报道称，有些国际学生醉醺醺地参加考试却依旧能获得学位。未公开的调查专员报告中揭露了有关考试试卷被泄露给国际学生的问题，该学院被允许在面临维多利亚州议会审讯之前对此事作出反应。之前的案件还有对新英格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国际学生通过商业手段抄袭的控诉。

这些对学术规则的违反是十多年高等教育资金不足造成的结果，实在预料之中。就像今日一所大学的校长描述的那样：“联邦政府投入的资金在1996~2004年间实质分摊到每名学生头上下降了约30%”。的确，2007《教育瞭望》的数据显示在1995~2004年的十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投入高等教育的平均公共资金上涨了49%，而澳大利

亚的高等教育资金却下降了4%（澳大利亚是成员国中唯一一个数据下降的国家）。只有当资金回复到以往水准（联邦政府承诺将努力达到该目标），并承诺针对科研实际花费下拨资金，大学和机构才能继续并坚持将国际化作为一项推动文化和学习的策略，而不是将国际化仅视为一项预算策略。

新发展

联邦移民局近期采取行动控制移民，降低短期、低质量课程的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由此产生了淘汰效应，导致一大批依赖国际学生学费、低质量的私立职业学院纷纷倒闭。从修改后的职业列表来看，已获得工作机会的高级技术人员有优先权，这无疑会降低那些以为移民后发展前景好而留学澳洲的国际学生比例，这个比例已经从2005年的5%不可思议地上升到2009年的24%。如今各项预测均认为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的数量也许会下降20%，尽管人数的下降更多地发生在职业学院，同时伴随的是收入的下降，对于那些过分依赖国际学生学费的大学，其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近期宣布的各项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澳大利亚那令人羡慕的国际学术形象，重塑澳大利亚被严重破坏的“品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国际教育商业化导致的，并非意料之外。澳大利亚给其他国家上了重要的一课。例如，英国不仅效仿澳大利亚的举措，并且于近期称大幅削减下拨大学的预算只能逼得它们更为迫切地从国际学生那儿寻求收入。

作者注：本文改变自作者的《非洲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一文，将出版于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出版的《高等教育论坛》（Higher Education Forum）刊物。

风雨飘摇的加州：奥巴马的强心剂能持续多久？

John Aubrey Douglass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箱: douglass@berkeley.edu

由于预算大幅缩减，加州著名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正面临巨大的抉择。“大萧条”发生之前，该州由加州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加州州立大学 (the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和近百所社区学院三个支柱组成的高等教育系统早就显现出缺乏公共拨款的迹象。过去20年中，该州的高等教育生均拨款直线下降，而入学人数却在稳步上升。现在，这一趋势大大加速了，政策产生的影响也是史无前例。

缩减入学人数

加州高等教育系统建立在扩大入学机会和保证教育质量的理念之上，现在这一逻辑正在被快速侵蚀。过去，即使在预算分配很糟糕的情况下，加州的公立高校也能容纳该州所有申请入学的合格学生（合格学生是指那些上完必修的课程，获得了很高的成绩，并在标准化测试中表现优异的学生）。但是好时光一去不复返。近来，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开始限制入学人数，这是在二十世纪初加州理念诞生以来第一次缩减人数。

上个学年，加州大学系统拒绝了2300位合格学生的入学申请，新生入学数量减少了6%。由于通货膨胀和入学人数上升，加州给该校的生均拨款比1990年下降了40%。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1990年的生均拨款达到15860美元，但现在只有9560美元。

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在校生数为45万人，比加州大学系统在校生数多两倍。去年，

加州州立大学拒绝了2万名合格学生的入学申请，并计划在2010~2011学年在此基础上继续减少2万个招生名额。结合课程数量下降的趋势，人们能够预见，两年多的预算削减将可能造成5.6万名学生无法进入加州州立大学学习。该校限制招生数量的做法是为了应对连续几年的预算削减，如今年上半年3130万美元的削减，年中的6600万美元，下一学年的削减幅度可能会更大。

不过，加州社区学院系统倒是可能吸纳一些被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拒绝的学生。但是，这些仅提供两年制大专学位以及各种证书教育的社区大学早就被增加的高等教育需求淹没了。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社区学院已经是美国经费短缺最严重的学校。上一财政年度，它们的预算削减了8.25亿美元，造成了社区学院的课程大幅减少，而同时25万名学生被拒之门外则显示其招生能力的下降。

对低迷状况的解释

这一令人不悦的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呢？除了当前重击加州的经济崩盘外，大量深层次的宏观结构问题还在继续产生着影响。一方面，监狱和医疗补助开销的增长以及为加州公立中小学进行拨款的强制命令都挤占了高等教育争取州拨款的空间。宪法没有强制要求高等教育的优先性，因此公立大学，即加州大学系统和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已经在“无约束条件”拨款的行列中被排在后面。

另一方面，立法者不能掌控该州局面的问题也更严重了。如果预算削减更精明一些，加上经济复苏后该州收入的增加，本能阻止如今这么大笔的经费削减发生。但是，该州的预算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右翼人士和反政府保守派（“饿兽”理论，又称 *Starve the beast*，即故意制造经济危机的策略）挟持了。州议会投票上，2/3 通过就决定预算的这一不同寻常的要求就是对这些人的纵容。肯定有许多人要承担责任，但实情是一小撮来自安稳的、相当保守的地方的政客依然左右着预算。

学费上涨已经成为一个用来缓和州预算削减的政策杠杆。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也消化了许多教育的重要拨款需求，如给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 6.4 亿拨款以及给社区学院的 1.6 亿美元拨款。

但是收入来源还是不够阻止课程数量的减少、教师员工的裁撤、工资的降低以及入学人数的减少。加州政府和加州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都站在财政崩溃的边缘，刺激计划避免了彻底的爆炸。2009~2010 年财政年度，加州的公立中小学和公立高校还是有约 79.7 亿的经费应对一年的开销。然而，由于高等教育预算问题的严重性，所有刺激拨款都在上一财政年度花的差不多了，这给 2010~2011 年财政年度留下了一个大窟窿。

加州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和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数已经几乎在全美垫底，现在它很可能还会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上进一步下降。

然而，除了教育需求被拒造成的直接影响，以及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学生的影响，加州还可能终结其对高等教育曾经声名远播的一贯追求。现在对于怎样解决加州高等教育系统日久成疾的大麻烦，还没有任何一致的意见或者政治领导的介入。

2011 年加州的预算赤字为 190 亿美元，这意味着大幅降低预算压力还是很遥远的事情。美国各州只有很小的为运营经费举债的能力，于是联邦政府就成了最后一根稻草。简而言之，州预算主宰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命运；也就是说，多数国立高等教育系统的财政与国家预算通过借债能力联系在一起。

展望未来

在改进加州高等教育公共拨款的第一线曙光中，阿诺·施瓦辛格州长（Governor Arnold Schwarzenegger）于 2010 年 10 月签署了一份延迟多日的加州预算案，其中给加州大学系统和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各恢复了 1.99 亿美元的拨款。现在两者已经决定明年就把刺激计划中所剩无几的经费花光，而明年它们还将获得约 6.1 亿美元的经费。

但是，这距离两校在 2007~2008 年学年的预算经费还是少了约 6.64 亿美元。社区学院在该预算案中有 5% 的经费增长。由于预算案建立在该州良好的收入预期之上，所以许多人希望年中新州长能带来一些改观，如期望用 55 亿可能的联邦拨款填补该州 190 亿美元的赤字。新的预算案没有增税，开支削减了 75 亿美元，并且推迟了对中小学和社区学院的拨款支付。

加州面临的困境也许是美国各州中最糟糕的。但是类似的情况在全国也随处可见，并对入学机会、获得学位的时间、学位授予数量以及公立高校的员工士气都有不良的影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所有成员中，也许只有英国和爱尔兰的高等教育系统正面临同样的预算紧缩。但是加州情况的特殊性在于：该州的人口数量在上升，今后 40 年可能将从 3700 万增长到 6000 万。

人们可能会假设，今天各国为应对“大

萧条”所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加快全球在人力资本发展竞争格局上的转折，美国可能会在这场比赛中败退。

可以预期到的是，美国的学士学位获得率将在不久的将来开始下降，特别是在加州这样的即使入学需求上升入学机会依然下降的州。即使最终全球经济会复苏，在加州这样的地区公立高校也不可能全面恢复公共拨款。

我们正处在重新组织和重新定义这一著名系统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清楚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0年是1960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出台50周年纪念。曾经，就是这个总体规划引导了当时已

经极其成功的加州高等教育系统的继续扩张。它努力平衡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校系统的高水平、高度分化。现在加州所发生的许多情况都是历史的倒退。

加州怎么才能再次成为支持和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先锋呢？我写了一篇新的文稿，其中讲述了三立系统（the tripartite system）的历史，分析了它的优点和弱点，并介绍了全世界对高等教育进行重大投入的国家的改革经验。文中，我还提出了一个“重新想象的”高校网络和一个“智能增长的”计划。我热切希望一场关于加州高校未来发展合理路线的争论就此开启。

委内瑞拉高等教育：查韦斯革命

Daniel C. Levy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教授、

电子邮箱: DLevy@uamail.albany.edu

乌戈·查韦斯 (Hugo Chavez) 与委内瑞拉高等教育的冲突是当代左翼、平民主义政权与拉丁美洲高等教育之间对抗史的鲜活例子。这些政权往往将现存的高校视为置身于革命之外的精英主义，而大学看到的往往是政权对其学术自由的控制。从 1910 年墨西哥革命到二十世纪 40 年代，高等教育与政府两者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艰难地维持着。二十世纪 60 年代后期，秘鲁的左翼军事政府曾与高等教育关系恶劣。二十世纪 70 年代，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 (Salvatore Allende) 领导的社会主义联合政府同时面临热烈的拥护和强烈的反对。同一时期，庇隆主义者与大学利益的冲突再一次出现在阿根廷。当然，现在最著名的例子是古巴。直到二十世纪 60 年代初，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在古巴就意味着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全盘接管。拉丁美洲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右倾政权 (有时是军人政府) 和高等教育冲突的例子，但是今天的委内瑞拉并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

查韦斯自 1998 年以来担任委内瑞拉的总统，他一直在改造该国的高等教育。他的支持者认为其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向和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 (Bolivarian Revolution) 总方向一致，即社会主义、平民主义和强烈本土意味的改革。而批评家们认为改革是对民主、学术自主和质量的践踏。双方都认为许多方面被改造了，尽管他

们对好坏的评价是截然相反的。

我们必须将委内瑞拉的高等教育转型放在其政权驱动式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去看。查韦斯的政策将该国内外的左派分离开来。奥利弗·斯通 (Oliver Stone) 新近的纪录片《南方边界》 (South of the Border) 广受好评，然而事实是国际上主张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感到梦想幻灭。查韦斯政权由于得到石油收入的支持，在外交事务上非常反资本主义、反美国政府。它已经和伊朗、叙利亚等国结成同盟，自然地成为该地区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平民主义左派的朋友。它也快和它的邻居、美国的密友哥伦比亚闹翻，并已然成为哥伦比亚的反政府武装分子的避难所。在国内的高等教育领域，查韦斯政权与委内瑞拉传统上左倾的国立大学 (Universidad Central) 的冲突也显现出国内的裂痕。由学生领导的反对党提出了“第三条道路”，既反对查韦斯，又反对查韦斯所拒绝的传统、保守的精英分子。

玻利瓦尔大学

查韦斯最新的高等教育改革包括新的国立高等教育政府拨款的政策变动，这一改革引来了人们的批评。拨款的基准将是在校学生数。但是为什么历史悠久的国立大学的校长会强烈批评这个方法呢？因为查韦斯对公共部门的改造是通过创立和扩张新大学进行的。2003 年，他通过法令建立了玻利瓦尔大学 (Universidad Bolivariana)。这所学

校 2006 年的学生数已经达到 18 万之巨，该校对外声称的目标是到 2009 年入学人数需达到 100 万，包括建立 190 个分校。2006 年，该校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在校学生数最大的学校之一。而向着 2009 目标奋进的任一举动都会使其成为最大的拉丁美洲大学。该校不仅免学费，还免试入学。免学费在该国（及拉丁美洲）的公立学校非常常见。少数其他国家（如阿根廷）也有免试入学的规定，但是玻利瓦尔大学的录取政策还要“更胜一筹”。委内瑞拉过去的鼓励入学政策使该国的入学率高于该地区其他国家，现在的录取政策比过去走得更远。

玻利瓦尔大学是查韦斯“苏克雷计划”（Mission Sucre）的一部分。该计划下的各个社会项目都是为了帮助穷人和土著人，以期促进社会转型。一方面，批评家们在这所大学身上看到了另一种政治控制。另一方面，这所大学和它的守卫者以他们作为反对者的立场声称，他们是在培养多元文化和民主。

现有的私立高校和公立学校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查韦斯的政策已经孤立了该国的私营经济。当局常常提及“公益”，与“私利”相对立。在基础教育领域，私立学校已经发觉自己面临挑战和限制。在高等教育领域，私立大学面对的是强烈的敌意。例如，桑塔立塔大学（Santa Rita University）已被指控非法开课。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这种指控往往导致此学校被取消资格认证或延迟其获得资格认证的期限。然而，该校在 2010 年被收归国有。该校声称

这完全是政治打击。不过，多数委内瑞拉私立大学仍然能够开设并持续运营。尽管国立大学受到更大的操控，但私立大学仍保持自治，这在该地区是有先例的——就像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军人统治下的阿根廷和 60 年代中期军人统治下的巴西。

比私立大学能够在委内瑞拉继续开设更让人吃惊的是，该国“自治的”公立大学仍然能继续保持自治。这些年来福利——可能在拉丁美洲无出其右——多数还由国家继续提供。（查韦斯时代以前，“实验性的”公立大学与“自主的”公立大学并行发展了很长时间，其目的之一是为了从中做出选择。）查韦斯对自主的公立大学发展和私立大学发展都不加干涉，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人们仅能推测：也许查韦斯还不想让中产阶级反对自己的立场更为坚定吧。

最近，国立大学遇到的问题减少了自治大学的相对比重，而并非直接封杀这些自治大学。由于与当局政府同盟的新的公立大学大幅度增加，这些自治大学的重要性也因此削弱。同样的，如果私立大学没有受到直接的压制，也就失去了相对地位。仅在五年前，私立大学的在校学生数还占该国总大学在校生数的 40%，现在由于新公立大学的增加，这一比例已经降低了一半。

查韦斯现在的任期要持续到 2012 年。即使他在选举中被打败（目前还不确定）并且离开权力中心（也不确定），那么从现在开始高等教育会发生什么呢？在选举以后又会发生什么呢？这样的体制还会进一步被改造吗？

中国学生和印度学生流动性背后的驱动力

Rahul Choudaha

DrEducation.com 网站创始人、国际高等教育专家

电子邮箱: Rahul@DrEducation.com

印度和中国不仅在全球经济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两国在全球国际学生供给方面的影响力也愈加明显。两国学生在国际学生中的比例从2004~2005学年的25%上升到了2008~2009学年的30%。过去五年中,到美国求学的印度和中国国际学生增加了5.9万人。印度和中国国际学生的快速增长以及流动趋势,其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理解国际学生流动的背景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有效地实施政策和措施。

影响中国和印度学生流动的关键,从学生供给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因素,一是国家越来越繁荣,负担留学教育的实力不断增强;二是两国高等教育在扩张的同时质量的下降。从学生需求方面看也有两个因素,一是教育输出国的大学为弥补预算削减而强势扩大招生范围;二是招生渠道和教育服务提供者的选择面更为宽广,也更容易获取。

国家更加繁荣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蒸蒸日上,这使其学生更有能力承担在国外接受教育的费用。根据2009年《亚太财富报告》,中国和印度两国各有47.7万和12.7万百万富翁(以美元计)。每年,两国新增的百万富翁数量分别为11.3万和4.3万。另外,预计2008~2018年两国的百万富翁数量将增长两倍。

国家越来越繁荣的现象也反映出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新的人才。例如印度和中国的保险业,两

国在二十世纪90年代都在保险业推动了改革,并导致这一行业的扩张,这样一来也推动了对新行业的需求,如精算师,目前对这类从业人员仍存在巨大需求,同时也受到人才市场相当多的青睐。同样,一些新的行业和职业也在印度和中国创造了新的财富。

高等教育扩张而质量下降

尽管印度和中国经济都发展了,高等教育供给也快速提高了,而且中国也已经对其顶尖大学的学术质量问题进行了重点投入并取得了较为合理的成效,但是质量问题始终没有得到重视,从而导致了人才短缺,以及受教育的年轻人高学历但就业能力低下的状况。在中国,总的入学率在十年之内从6%上升到23%。然而,根据中国教育部的资料,2010年的毕业中有150多万找不到工作。同样的,印度工程学的年招生数在5年内提高了一倍,但其中只有1/4的学生有相应的工作能力。

上述情况导致了现在这样看上去不合理而实际上很自然的结果:一方面是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这一人才短缺问题往往并不表明学生欠缺能力,而是大学质量下降使其不能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学习和发展机会。在这些学生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想去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和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因此这类学生在申请过程中特别需要帮助,他们通常会向中介和代理寻求手把手的指导。而多数自

助的、高质量的学生并不通过中介，他们直接自己申请。

大学伸向域外的橄榄枝

在学生需求这一方面，国家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预算削减，这就推动了大学激进地招收国际学生。根据美国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The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的资料，全美至少有43个州实施了高校拨款削减，例如，佐治亚州2011年的预算中，给公立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比前一年减少了1.51亿美元，降幅达7%。由于国际学生支付非本地生源学费，且也不能接受联邦资助，因此通过提高生均学费，就能帮助学校解决部分财政上的困难。

一些公立大学，如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阿肯色州立大学（Arkansas State University）等，都宣布其2010年秋季招生计划中国际学生数将实现两位数增长。这一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是它们向印度、中国这样的国际学生来源国伸出了橄榄枝，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学校对国际学生的接受度增加了。例如，加州大学系统的新生中，国际学生的比例从2008年秋季的3.5%上升到2010年秋季的5.3%，反映出该校对国际学生更高的接受度。

新的招生模式

新的国际招生方式的出现和广泛接受确保了大学在国外的招生。这些新的方式包括网上广告和付费中介等。例如，《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曾

引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执行主任和首席执行官马琳·M·约翰逊的话，她说：“对中介或顾问的广泛接受不是发生在5年前，而是1年以前。”

几年以前网络招生渠道还不存在，现在许多网站都已经成为学生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如中国的Chasedream.com和印度的Pagalguy.com。Chasedream.com的会员约22万，Pagalguy.com的会员则超过40万，两者都面向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教育的潜在学生。一些大学现在正在使用网站作为广告渠道，为潜在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当新的招生渠道越来越被广泛接受的时候，关于它们的服务标准和职业道德标准的讨论也在不断展开。

结论

当越来越多印度和中国的学生涌入美国的时候，以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学生比例却从2000年的26%下降到2008年的19%。这一损失不只是学生人数上的，也是人才的损失以及这些人才所能带来的创新和发展机会的损失。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竞争越来越剧烈，同时政府支持学校的财政预算又在下降。因此，了解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际学生生源大国学生流动趋势发展的驱动力将会帮助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研究者更有效地从这些国家招生。从这些推动因素中也能清晰地看到，国际教育的商业意图正在渐渐超过其学术价值和跨文化价值。

新书简介

Gasman, Marybeth, ed. *The History of U.S. Higher Education: Method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22 pp. (pb). ISBN 978-0-415-87365-9.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本书围绕美国高等教育的一系列主题收集了一批与个人经历和历史讨论相关的文章。本书的焦点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探讨相关主题,用档案研究、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对大学和学院制度进行历史研究。

Hoffa, William W., and Stephen C. DePaul, eds. *A History of U.S. Study Abroad: 1965–Present.* Carlisle, PA: Frontiers Journal, 2010. 511 pp. (pb). ISSN 1085-45688. Web site: www.frontiersjournal.com.

本书收录了关于1965年以来美国出国留学情况的文章,相关章节包括:相关国家政策和全球化及其对留学的影响、出国国际学生的多样性、出国留学经济、技术的影响、课程、校园国际化以及留学领域的专业化等等。

Johnson, David, ed. *Politics, Modernization,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Russia: From Past to Present.* Oxford, UK: Symposium Books, 2010. 173 pp. (pb). ISBN

978-1-873927-41-0. Web site: www.symposium-books.co.uk.

本书从多个角度考察了俄罗斯的教育改革,其中多数章节都关注高等教育领域。本书讨论的主题包括:高等教育的民主化、高等教育统一入学考试、学校重组以及高等教育的管理。

Kaiser, David, ed. *Becoming MIT: Moments of Decis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0. 207 pp. \$24.95 (hb). ISBN 978-0-262-11323-6.

本书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50周年献礼书之一,主要关注该大学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具体的主题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早期历史、战争对课程和研究的影响、战后的扩张时期、生命科学的发展以及院校合并。

Kelo, Maria, and Tim Rogers, with Laura E. Rumbley. *International Student Support i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Needs, Solutions, and Challenges.* Bonn, Germany: Lemmens, 2010. €29 (pb). ISBN 978-3-932306-99-0.

本书主要围绕欧洲大学中的非欧洲学生展开。在博洛尼亚时代,这些学生与欧洲学生相比有不同的需求。书中分析了大学和政府的政策,阐述了对学生、大学政策和学习

项目的调查结果,并对未来的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

Maki, Peggy, ed. *Coming to Terms with Student Outcomes Assessment*. Sterling, VA: Stylus, 2010. 227 pp. \$24.95 (pb). ISBN 978-1-57922-435-6. Web site: www.Styluspub.com.

本书是关于美国大学中教授对学生学习和成绩评定的看法。作者讨论了他们自己的方法,以及他们为评估学生设计的工具。书中包含一些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案例研究。

Marginson, Simon, Christopher Nyland, Erlenawati Sawir, and Helen Forbes-Mewett. *International Student Secur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14 pp. (pb). ISBN 978-0-521-13805-5. Web site: www.cambridge.org.

本书讨论了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的安全保障问题,涉及一系列国际学生访谈和对相关文献的分析。书中分析了公共领域的移民问题、居住情况、医疗以及财政等问题,并对私人领域的语言能力、亲友、不同文化间的关系等也提出了对国际学生怎样适应学术环境的洞见。本书是从国际视野对这些重要领域进行研究的首本专著。

McMillen, William. *From Campus to Capitol: The Role of Government Rel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5 pp. \$40 (hb).

ISBN: 978-0-8018-9459-6.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一关系也对大学越来越重要。其中高等教育拨款是最重要的,但是关于知识产权、科学研究、学生贷款等问题的政策举措也很重要。作者讨论了这些问题在美国的情况。作者是一位阅历丰富的美国政府事务官员。

Poole, Gregory S., and Ya-Chen Chen, eds.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Neoliberalism and the Professoriate*.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2009. 180 pp. \$45 (pb). ISBN: 978-94-6091-126-2. Web 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

亚洲的学术职业正随着大学的改革发展不断变化着。本书关注了日本、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部分地区的情况。书中涉及的主题包括:日本私立大学的教授,日本的改革和国际化,日本大学的行政工作,香港的学者及其“西化”的学术体制等。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Hiroshima University. *The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1992-2007*. Hiroshima, Japan: RIHE, 2009. 300 pp. (pb). ISBN 978-4-902808-53-7. Web site: www.en.rihe.hiroshima-u.ac.jp.

“学术职业变迁研究”是一个多国参与的关于全世界学术职业观念的研究项目。本书的重点是学术职业和观念,回顾了其在过去几十年的变迁。书中的重要内容有国际化

与学术职业，以及比较视野下的学术职业。
书中也阐述了一些国家的案例研究结果。

Ritzen, Jo. *A Chance for European Universiti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1 pp. (pb). ISBN 978-9089-642417. Web site: www.aup.nl.

本书的作者是荷兰前教育部长，现任马斯特里赫特大学（Maastricht University）的校长。作者的观点是，欧洲的大学已经失去了它们的竞争优势，如果它们要参与全球竞争的话，就必须创新。作者呼吁，治理结构应该更加有创新意识，政府拨款应该部分地被私人资助替代，博洛尼亚进程应该包括质量保障和其它全欧洲一起采取的行动。

Saroyan, Alenoush, and Mariane Frenay, eds. *Building Teaching Capac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A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Model.* Sterling, VA: Stylus Publishers, 2010. 211 pp. \$35 (hb). ISBN 978-1-57922-410-3. Web site: www.Styuspub.com.

教师发展或教师培训，特别是教学培训，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重点关注的新问题。本书讨论了比利时、瑞士、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家教师发展方面的新动向。一些章节对教师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Seggie, Nevra Fatma, and Reitungetse Obakeng Mabokela, eds. *Islam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2009. 100 pp. (pb). ISBN

978-90-8790-703-7. Web 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

本书探讨了伊斯兰教和高等教育的交集，书中的文章涉及到的问题有美国和伊朗的学术自由，南非穆斯林学者的体验，英国大学中的穆斯林女性，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和高等教育，以及对美国本科生核心课程的相关讨论。

Segrera, Francisco López, Colin Brock, and José Sobrinho, eds. *Higher Educ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8.* Caracas: UNESCO-IESALC, 2009. 352 pp. (pb). ISBN 978-980-7175-03-6. Web site: www.iesalc.unesco.org.ve.

本书涉及拉丁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也包括这一地区的重要国家，包括古巴、安第斯山脉国家、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等。书中提供了这些国家最新的统计数据，以及许多最具洞察力的高等教育分析人士的看法。

Smart, John C., ed.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25.*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0. 567 pp. (hb). ISBN 978-90-481-8597-9. Web site: www.springer.com.

本书距离初版已经25年，现在它仍是高等教育研究最有价值的资料之一。该手册只关注美国的情况，作者都是美国学者。因此虽有国际视野，但主要对美国研究者更为有用。这一版书中的主题是关注财政资助在提

高入学人数和学生保留率、促进自然科学、技术、工程、材料四个领域博士教育改革以及改进研究图书馆、教师与管理人员关系等方面的作用。

Stromquist, Nelly P., ed. *La Profesión Académica en la Globalización*. Mexico City: ANUIES, 2009. 319 pp. (pb). ISBN 978-607-451-008-9.

本书的重点是学术职业如何应对全球化。书中收录的文章讨论了秘鲁私立大学中的教师问题，墨西哥大学员工的工作环境问题以及俄罗斯学术工作环境的变化等。

Teranishi, Robert T. *Asians in the Ivory Tower: Dilemmas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10. 192 pp. \$31.95 (pb). ISBN 978-0-8077-5130-5. Web site: www.tcpres.com.

美国的亚洲人被视为“模范少数民族”，他们的教育水平和成就都很高。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亚洲民族都这样。本书对亚裔美国人进行了分类，对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进行了分析，并探究了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

Toby, Jackson. *The Lower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 Why Financial Aid Should Be Based on Student Performance*.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2010. 208 pp. (hb). ISBN 978-0-313-37898-0. Web site: www.abc-clio.com.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社会学家，他认为美国的入学标准已经降低了。他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将学术表现与财政资助和财政需求结合起来。作者认为需要给学生激励，他们才会努力学习。

Weber, Luc E., and James J. Duderstadt, eds. *University Research for Innovation*. London: Economica, 2010. 358 pp. (hb). ISBN 978-2-7178-5797-9.

本书起源于大学领导者的格里昂会谈（the Glion seminars）。本书的重点是研究与创新以及高等教育的作用。部分章节讨论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科学研究和创新情况，如拉丁美洲、新加坡、加拿大等等。其它章节关注了改革的战略以及大学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介

为了加快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上海交通大学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在原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直属的“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称高教院）。高教院下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编辑部。

高教院坚持以实证和定量研究为特色，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为标志，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以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为标志，在政府咨询方面已经产生广泛的国内影响。

以小规模、创新型、国际化的世界知名人才培养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培养高等教育学、科学与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和在站博士后总人数的规划目标为 80 名，且大部分博士生有出国访学经历，国际学生比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知名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研究团队，有选择地追求卓越，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定量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等领域打造国际学术品牌。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S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GSE aspires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cholarl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emphasiz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ocuses on applied research, policy studies and consultation.

GSE builds on the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of the former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and updated annually,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Consultation reports 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policies, which are provided to Chinese govern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have attracted national attention.

GSE focuse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pecifically on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has three research groups, namely the Center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centers will have world-class research teams, lead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a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student body.

GSE will uphold the best academic values—a commitment to academic freedom and original inquiry, servic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and beyond, and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to graduat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Vol. 4, No. 1, February, 2011

Guoji Gaodeng Jiaoyu

(Translated from Number 62, Winter 2011,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Issues

Rankings Seasons Is Here.....	1
Nine Errors in Building a New World-Class University.....	错误! 未定义书签。
The Corruption of Ethics in Higher Education.....	9
Liberal Educaton in the Global Perspective.....	12
Agents and Third-Party Recruiters i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15

The Inernationalization Debate

Five Myths About Internationalization.....	18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20

Arica Focus

African Higher Educaiton: The Rise and Fall in the 20 th Century.....	22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al Inequalities in Ethiopia.....	24

Australia's International Problem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Australia: A Long Way Down.....	26
Australia: The Perils of Commercialism.....	28

Countries and Regions

California's Downfall.....	30
Venzuela: The Chavez Revolution.....	33
Drivers of Mobility of Chinese and Indian Students.....	35

New Publications.....	37
-----------------------	----